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与西村妇女

1950-1980

胡桂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与西村妇女

1950-1980

胡桂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西村妇女：1950－1980 / 胡桂香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161－8278－9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关系—农村—妇女—生活状况—研究—湖南省—1950－1980 IV. ①D4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672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65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胡桂香博士的新书就要出版了。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我无比欣慰，为她高兴。桂香来华东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已经在湖南女子学院任教了。相比其他同学来说，她显得更为自信和成熟。在中国妇女史和新文化史等研究生阅读讨论课上，面对学术经典中所涉及的当代史学前沿一些陌生而富有挑战性的概念、方法和框架，桂香并不畏惧，反而学得津津有味。她思想活跃，学习主动，颇能创造性地抓住所讨论问题的关键之处，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桂香因为是在职读博，在学校脱产学习只有一年，但这一年她确实是充分地利用了，对于女性主义史学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及问题意识有所把握，并很好地运用到了她博士论文的选题、研究和写作中。在过去数年中，桂香一边读书，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写作，一边养育儿子，有一段颇为艰辛的奋斗史。如今，这部从博士论文修改完成的书稿就要付梓了，这是收获的季节，是一个学者成长并成熟的见证。

在我印象里，桂香前额那一排整齐的刘海，下面一双灵动的眼睛和总是有点儿微笑的神态，活脱一个湖南农村的小媳妇儿，带着乡土的清香来到大都市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我希望她/他们写自己的历史，写百姓的历史，写自下而上的历史。桂香写的是西村媳妇儿的历史，她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吉尔兹人类学方法论中有一个命题，即作为研究者的外部人观点与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内部人观点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完全沟通是否可能，从而提出著名的深描理论。然而，对于吉尔兹命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即打通内部人观点和外部人观点的最佳途径就是如桂香这样的从内部走出来、带着外部的视野和理论武器又回到内部去做研究的学者。中国的历史学需要这样的学者来挑战、拓展、修正传统精英史学所描绘的历史图景，以助于丰富和刷新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问题就一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

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计划生育不断取得成绩并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相呼应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女性在这一生育政策当中不仅成为重要的节育动员对象，而且是这一政策主要的身体实践者和重要动力。既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农村妇女都是这一变革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她们当然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言说者和解释者。然而，正如桂香所言，这些农村女性却因为出生地（农村）和性别（女性）而被双重边缘化了，大多数关于计划生育的著作和言论都将计划生育本身作为研究重点，而对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之中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精神生活等忽略在一边。

桂香这本书中的内部观点是建立在对西村妇女所做的大量访谈和自身经历基础上的，难能可贵。而这些内部观点在女性主义史学和历史人类学的交叉分析之下产生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犀利观察和论述。比如，她在描述 20 世纪 50 年代现代国家试图推进新生育观念遇阻时指出：“对于中国家庭尤其是中国农村家庭来说，传统的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已根深蒂固，当一种新的生育观念渗入到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时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后者，毕竟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念不仅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心中，它更是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与自我认知。西村的生育习俗已经深入到人们的脑海中，而且更为难的是生产过程本身是妇女自身去承受的事情，而生育这件事情却是有关家庭、有关家族的大事，在这当中，妇女不仅自己默默承受生产中的痛苦，而且也只能顺其自然，如果要人为地去中断，妇女是不能做主的，她或者可以偷偷去进行。同时，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是从经济利益或者国家发展为出发点，这些宏观的大道理对村民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在论述 20 世纪 70 年代避孕法在乡村社会普及时指出了女性身体成为权力的角逐场这个历史性事实：“避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命终结的过程，也不是妇产科医生 30、40 分钟的门诊手术，甚至是中医的几贴打胎方，而是国家政策、性意识、家庭及性别分工等意识形态在妇女生育方面的角力。”

我激赏桂香这样的青年学者，也很高兴地看到全国有一批这样的将自己的历史、人民的历史、自下而上的历史作为志业的青年学者。中国史学的未来属于他们。

姜进

2016 年暑假

写于海上凤凰城

序 二

我与胡桂香博士仅有两面之交，且都在 2005 年：夏天我去她的学校应邀作妇女和性别研究讲座，我们初识；秋天她来天津参加我主办的为期两周妇女/性别史研究班，她好学深思，积极活跃，因这个机缘，后来她被授课老师之一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姜进教授招为博士研究生，今年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专著嘱我作序。开始有些犹豫，就专业性而言，我并不是合适人选；但读其书稿，不但与我的“农村”和“农村妇女”情结一拍即合，更为该书的三个特点所感动，心有戚戚焉：一是学术抱负和社会关怀的结合和统一，二是从独特的性别视角提供了以基层农村为场景的上下互动的 40 年计生史的全景观，三是引人深思提供反省过去规划今天的人口和生育提供思考的角度和议题。于是写了如下文字，与作者和读者切磋就教。

一

胡桂香博士的《生育的记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西村妇女（1950—1980）》一书是笔者目前见到的国内第一部以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计划生育政策领域的新作，也是妇女学研究领域以妇女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断代史的专著。以“生育的记忆”为标题，明示了作者的研究视角和立场有别于社会学将生育视为种族延续、家庭行为的制度，也与注重人口数量、结构变化并侧重国家发展和民生福利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所区别。该书自始至终沿着以生育载体兼主体的妇女为中心的研究理路，将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变化及推行策略都作为妇女生育记忆中的背景（语境），而把西村妇女的生育故事及其行动实践推向了前台并担当了主角。作为历史人类学的时间维度，锁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这四十年间由国家发动的计划生育运动在传统阻抗中的推进、家国之间的博弈、身处主体

和载体之间妇女的能动与无奈、计划生育在农村的得失成败……，都在作者历史追叙和围绕妇女记忆的打捞中一一展现，故事惊心动魄又娓娓道来，这部宏观微观结合的四十年计生断代史，也为六十年计生反省和改进提供了镜鉴，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抱负和现实关怀。

作为有社会现实关怀的当代历史研究学者，作者在书中第一章开宗明义地亮明她的问题意识——关注该历史时期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制定和推进过程中是怎样与妇女发生关联和处置的？妇女在其生存的人文、政治环境中是如何反应的？诸如：属于家庭“私”事的生儿育女如何与作为“公”事的“计划生育”政策联系起来的？计生政策和行政管理如何纳入女性身体和生活轨道，使她们在自愿和受多重制约管控处于“不得已”的矛盾旋涡中？进一步，还会发现，作者更将现实关注倾斜于计划生育对农村妇女日常生活和发展产生的影响，在每一个章节都有浓墨重彩的描叙评说。在学术抱负方面，作者试图在勾画20世纪50—80年代计生当代史纵横上下交织的全景观中，让读者随着时空交错、场景移动社会性别透镜既看计划生育40年间自上而下的国家决策、各级政府的强势推动的宏观图景，更看到计生政策村落推动的微观场域中多种力量博弈的细腻情节；尤其让读者听到来自生育承担主体妇女声音和计划生育实践体察她们的感受与需求，并一箭双雕地作为与国内外学术对话的基础。

为实现预期目标，作者调动了多种研究资源和手段。首先，历史和人类学嫁接的生育史研究领域在中国计生史可谓开先河，在对历史的断代方面，既有建基于文献和田野调查的三个阶段的纵向划分并做出特征性概括，又与正文主体三个章节——20世纪50—60年代计生开端的新旧碰撞、70年代“晚稀少”政策的犹豫与接受、80年代独孩政策的冲突妥协中生育文化转型接榫对应，承转自如恰到好处。为揭示计生史的复杂变化且血肉充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运用体现在作者选择婆家的村庄田野现场开展村情调查、现场观察、口述访谈获得第一手材料，与地方档案资料、统计数据和文献参照使用，作为进行研究分析阐释的依据，体现了微观人类学研究基层人群的优势。可以说，本著较充分地体现出历史断代的宏观语境把握和与基层话语实践互动互补态势的有机结合。其次，在观察视角、理论工具、结构框架、表述方式方面也多有独到之处。如上述时空交叉三阶段的移动变化、延续和新状态的动态观察，始终坚持村庄本位为重点、妇女记忆为中心、社会性别为理论工具，成为本书的特色和亮点。村

庄本位和妇女中心，是相对于政策制定者、行政系统逐级向基层村庄推进的强势国家而言，村庄处于政治权力具有双重性——垂直行政管理的底层和官民交接的前沿，发端 80 年代以来一胎化政策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村庄成为官民猫鼠游戏或短兵相接的敏感区和博弈场所，在这里演绎着国家、村社、家庭多重矛盾交织纠结的困顿、无解、妥协与渐变的发生。以妇女为中心，就是将计生这一多方博弈的场域聚焦于妇女，既不回避她们作为计生服务、管理、控制重点对象的弱势地位，又坚持发掘、揭示承载生育绝对重负的妇女对来自上述诸多方面施加制约、压迫中不乏自行选择的主体能动性。作者将社会性别为观察视角和理论分析工具贯穿于国家政策、推进策略、服务措施中，更将性别敏感的触角深入到村落传统生育文化、家庭制度和村庄管理等各个层面，成为该著的特色和突破，在中国本土计划生育研究中弥足珍贵。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西村概述中，对该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考察中，尤着重村落传统性别分工体制、家庭结构形式、妇女地位以及人口构成观察分析；同时通过分析西村村民对身体、生命观，以及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使读者看到自 1950 年以来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传统生育文化所发生的变化。最后，学术对话式的文献引征讨论是该著的特色之一，摒弃生硬地罗列文献，而是在行文贯穿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心得，在引述、评论中有所取舍，诸如“妇女适应论”（杨华）“亲密关系论”（阎云翔）、“有限共识论”（小浜）等学者对话，在引用和讨论中不乏独见，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二

进入正文第四章，作者展示给读者计生三阶段多维度时空交叉中国家、村社、家庭以至夫妻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复杂态势，演绎着四十年的惊心动魄的又颇具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全景观，引领读者进入历史现场情境中，在感受时代、体悟计生实践者人情的同时引发理性思考，这也是该著最具本土独创性之所在。其一，社会性别视角楔入了时空交叉各个面向的观察分析阐释，新意亮点纷呈中伴随着无解难点，从而引人入胜，发人思考。其二，社会人类学与历史交叉的实证研究既尊重历史的变化，又注意到变化中的延续性和新状态共存的不稳定性，使我们看到在政策制定和推行实践中上下互动的博弈、达成部分共识与矛盾仍在的历史复杂性面相。其三，为便于更加微观层面的细腻分析，分别将国、村、家的结构和

行为进行细化分拆以便深入观察。如将国家计生政策细化为内容和推进中的组织、动员、宣传策略等部分；把村庄层面又拆分为影响因素的经济模式、村治特点和社区文化等；家庭作为生育场域和与计生博弈的前哨，更细分为父系婚姻机制、传宗接代的价值诉求、性别分工的传统文化等。上述作为观察分析之基础的分拆，无论粗细宏微，都是内在有机联系和人为行为关联的计生运作系统中的一个部分。笔者以为，将夫妻身份和关系从家庭中抽离，或者在家庭分析中突出个体组合——生育的直接行为者——夫妻维度的强化，有助于身体、性/生育健康私密领域的权利关系分析，也便于这一关系与国家对妇女身体控制及造成的影响包括家庭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连接起来，尤其在反思 90 年代以来计划生育逐渐收紧的一孩政策和一孩半政策实施对妇女身体、性/生育健康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更有必要将其抽离出来。

从第四章开始，勾勒了由于上层认识的游移不决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从 50 年代初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政策贯彻到农村已到 60 年代末的计划生育的第一阶段。尽管那时“节育”重点是避孕（药物、上环、绝育等）意义和措施的宣传动员，但男性抗阻和妇女接纳的反差引发了作者的性别敏感，在历史和性别的交叉分析中，让读者体悟到集体所有制经济形态下，那些刚从“封建”社会“解放”、接着从家庭走出来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吃食堂”那种妇女解放的自豪感（曾爱珍等口述）；同时，也看到三重负担——集体生产、家务劳动和频繁孕育集妇女一身，早婚、早孕、多胎、少成的穷困和劳碌的不堪重负的抵抗，从而欢迎避孕节育。接生员鲁东秀的母亲怀 16 胎成活 6 个；陈菊英 16 岁结婚，生 13 个孩子活了 6 个，对频繁怀孕生好多闷气，也想许多办法，如不与老公睡，把他关在门外等；曾爱珍生了 10 个活了 5 个，不想再怀孕，不与丈夫同房，竟“挨咗好多冷拳”。鲁东秀就是亲睹了母亲生育之苦立志干接生员，积极宣传节育好处和避孕方法；妇女们有了节育政策撑腰和避孕知识获得，对节育为主的计生政策的积极响应是很自然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男人对计生的抵触：村干部的“两疑”（不是“毛”的政策，避孕的可靠性）、“四怕”（丑、羞、带头、误生产）；男村民延续无节制的性和放任生育的传统，甚至动辄对妻子回拒性生活大打出手，都构成了计生的阻力。作者将该时期的对节育政策接纳和抗阻归结为公私分域和两种生产中的性别分工，只是男女、夫妇之间的位置、责任的不同，这确实与当时温和计生尚

未触及到深层的连带性的父权制性别制度文化结构性的阻抗有关。

第五章带领读者进入 70 年代的第二阶段。从“晚稀少”（1973）计生政策出台到“人口非控制不可”（1975），再到对“晚、稀、少”界定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78），进一步鼓励生一个孩子（1979），1980 年开始了实行 35 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该章快节奏描述计生推进的步伐——从“工作组入村”宣传、组织和医疗服务为发端，排除“阻力与压力”强行“落实计划生育”做跟进，为完成上派的计生任务和减少男性阻抗，一改简易且风险小的男扎技术代之以对妇女实施“身体控制”的“各种节育方法”……随着步步升级的新计生政策在西村推进，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呈现第一阶段延续中的变化：宣传、动员、技术服务的骨干即依靠对象仍以女性骨干（大队妇女主任、生产队女队长、女赤脚医生和女接生员）为主，响应者中育龄妇女对节育避孕知识更加上心。张桂香说：“避孕节育，我们装作漫不经心，手里做事不停，其实心里听得认真得呢。”阻力依然来自男性，除了村干部、村民个人外，父系家庭结构性阻抗开始初露端倪：男人们以“面子”、“劳动力需要”为由，认为“没生出崽肯定不行”；父家长权特别是“婆权”余威犹在。如“吃皇粮”的赤脚医生赵秋芳生二女后带头结扎，婆婆阻止并坚持要她生孙子；徐清香婚后两年不孕，公婆冷眼，丈夫打骂，连生了两个女儿，公公开骂：“只晓得生丫头片！”怀上三胎婆婆求人不做人流，躲到娘家生出孙子才罢休。以往多胎生育掩盖着的生男偏好，这时父权家庭公然干预妇女生育并将其推向计生博弈的前沿而坐享生儿孙之利。作者这样归纳该阶段大势走向：“在这场运动中，有时政策和妇女结为同盟，一致抵抗传统父权制的多子观念，有效控制了生育，使该村计划生育取得显著成绩。”也是平实之论。

第六章以“冲突与妥协：独生子女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为标题，表述 80 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实施中复杂、深入、动态的博弈情状：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西村妇女”、“风暴来临：独生子女政策的登场”、“沉重的肉身：妇女们的压力”、“弱者的‘武器’：妇女们的应对措施”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与新型生育观的形成”五个小节展示十年内农村经济、政治巨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纠结在一起对西村人特别是妇女的作用和影响。

这里所说的“冲突”就是指 80 年代几乎同时推出的国家对农村的两

个重要的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独生子女政策”所引发的矛盾：一方面，这两个涵盖了农村的“两种生产”的巨大制度政策的转型本身发生了剧烈的冲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意味着集体经济的瓦解重新回到以家户为单位的土地使用权的再分配，导致物质生产的“土地”获得和人口再生产的“生育”产出事实上回到父系家庭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就在这时，独生子女政策猛烈地冲击着父系家庭的两个希望——传宗接代和拥有土地——都聚焦于必须生儿子上面；那时强制性的一胎政策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国家政策层面从1980年秋至1984年，严格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实施中为达到人口控制目标，采取了许多行政、经济等强迫手段，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给农民带来的恐慌和抗拒是决策者始料未及的，低估家庭父权制男孩偏好强烈意愿和滥用权力是重要原因。但是，1984年4月13发布的《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七号文件，作出了“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后又提出时间间隔为4年。这一对家庭父权妥协的、性别盲视的、加剧性别歧视的人口政策——所谓“一孩半政策”，妥协的结果在宏观层面造成人口性别结构的长期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在微观操作中由于缺乏性别视角采取有效对策研究，而用更加严苛、强制的手段推行，对妇女形成多重伤害：育龄妇女直接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也殃及女性从婴儿、女童、青年以及终身遭受全面歧视埋下新祸端，更有悖于党对妇女解放的许诺和男女平等的宪法条款的宗旨。再用性别视角审视几乎与此同期出台的联产承包在土地分配（承包地和宅基地）政策时，发现性别盲视对恪守延续数千年的民间“习惯法”推波助澜地加剧对女性土地权利损害的熟视无睹。村庄（原来的大队）和村民组（原生产队）在集体经济解体后被授权执行土地分配，其原则对上秉承政府稳定农民承诺长期不变和性别中立的“以户”为生产单位进行分配，完全沿袭了家庭父权制的婚姻、继承制度，以男性为户主，将男婚女嫁从夫居、父子继承的原则，复制到村庄集体资源分配中。如西村以户为单位分一亩宅基地，实质上是剥夺女孩宅地权，女儿只分承包地，婚后不能带走，或被村里收回或转移到兄或弟之妻子名下。这种剥夺女性土地权的做法实质效果加剧计生推进的难度。至今，出嫁妇女土地和出生性别比失衡，都成为21世纪农村性别不平等引发基层社会治理危机的两大难题，而认识根源皆出于对家庭父权和集体父权同构共谋导致性

别不平等危害的集体无意识。

除了经济权受损甚至剥夺影响到男孩偏好的加剧，“一孩半政策”还导致来自细密严酷的计生管理在肉体和精神心理上增加妇女的重负，从避孕、康检、人流、引产的管治对象，到给妇女准备的22种避孕药引发的身体反应，都是针对妇女肚子的精心设计。在西村，从1970年到1990年，承受结扎的男女比例为176:6。该时期，妇女在国家政策、家庭父权、村庄治理、经济资源掌控、文化习俗歧视综合作用下被建构、挤压到弱势处境中。作者又指出，妇女会借用这种社会资源和智慧，以“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措施”，去抵抗压迫和不公。如她们利用社会关系，为了生育男孩搞假结扎、假证明，为出生的孩子瞒报户口。还采取以退为进策略躲藏与外逃，成为“超生游击队”的一员。这也是弱者的智慧和以退为进的“妥协策略”的能动。当妇女话语权不强大的时候，以妥协求生存，不但在严酷的计生政策的缝隙中生存下来，更在父权家庭空间中寻求发展。这就是我对作者“妥协”的第二种理解。然而，这种弱者的生存发展策略是以妇女的牺牲为代价的，但“少子化”政策带来妇女另一种解放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毕竟以代际更迭的时间推移显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公共父权在同家庭父权的博弈中，妇女在“家庭结构的变化与新型生育观的形成”中得到新生机。年轻一代婚姻自主的选择，影响着夫妻亲密关系的建立，分家单过的年轻夫妻最多生两个孩子的核心家庭在增加；老一代如60年代的接生员鲁东秀，现已80高龄，表达了“喜欢自己赚钱自己花，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的自由。在促使家庭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变化的因素中，教育、职业和婚姻流动促进人们生育观、爱情观和家庭观改变尤为重要，而妇女成为推动改变的引领者。1957年出生的胡嫦钰，高中毕业，曾任教师，自由恋爱嫁到西村，担任西村的妇女主任20年间负责计划生育，受到村民和村干的信任和尊重。作者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在西村实施的正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受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西村的家庭结构与规模都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与80年代的婚姻形式变化有关，也与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关，而这最终导致了新的生育观念的形成。”这和阎云翔对下岬村在八九十年代经历了由“惊讶、对抗、应付到调整的过程”，“尽管村民们开始强烈反对一胎化政策，甚至不惜罚款超生，但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不少人改变了生育观念”的结论相呼应。

三

本书的价值,不仅限于历史人类学和性别视角结合的断代计生史提供的全景观,而且为反思和规划今天的人口和生育提供了思考的问题和角度。

反思一:父系传承的男孩偏好:从制度文化结构改变有无可能?

本著在本土父权制在生育场域逐步展现一个系统的结构。不光是西方背景中公私领域二元划分下的性别分工的单一维度,而是父系制家庭以传宗接代为动力的内外有别的导致男孩偏好的制度文化心理结构系统。公私领域在计生话语实践中早已被打破,随着计生政策的展开,原来生育作为家庭领域事务成为国家干预的重点甚至上升为基本国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家庭私事;无论国家通过各层级垂直系统的政策干预和技术服务,还是村庄的经济形态、治理模式和传统文化对家庭特别是夫妇的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关系。笔者认为,用西方的“公/私”领域二元思维模式不如本土的“内/外”之别更有解释潜力,正如韩国学者李相华所说:“当我们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关于‘公’‘私’的理论框架时,在东亚的语境中,‘内’‘外’的概念必须被创新考虑”。^①在中国农村,“内”/“外”概念不但意味着在性别分域中男女活动、劳作生产空间和责任分工意义的不同,也具有特别强调的一套婚姻、家庭(族)和与“家国一体”或“家国同构”的国家组织结构系统内外、亲疏的意义区分。本著中已经展现的以家庭父权为中心,公共父权(包括国家、行政系统管理、村庄社区自治)或复制或新创家庭父权的原则和制度规范来解决性别安排的政策设计、管理方式、资源分配,由于自上而下的社会性别视角缺乏或盲视,往往在实践中南辕北辙。目前国内已经有学者和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共同探索如何从基层改变父权制的家庭和社区工作,重建村庄性别平等、人际和谐、环境协调的新农村,在十几年的探索中,同时改变了出生性别比失衡,连续八年没有超生和多生男孩。^②

反思二:性和避孕、医学和技术:如何改善生育承担者妇女的性/生

^① 李相华:《父权制和儒家——女性主义批判与韩国儒家文化重构》,杜芳琴、崔鲜香编:《全球地方化语境下的东亚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性别平等倡导课题组:《男女平等:农村扎根的理论探索与社区实践——性别平等政策课题组访谈录》,《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5月,第29—39页。

育健康权利？

该著在这方面提供促进我们在这方面反思的丰富资料引发读者如下思考：50年代的推广的简便安全的男性结扎为什么到80年代基本消失，而由女性独担？男性不承担避孕责任却理所当然享受性欲满足，不计虑妻子的意愿和频繁怀孕、生产的痛苦和子女夭折的感受原因何在？到70—80年代严酷的妇女身体控制压迫尤其为生儿子而频频流产、为了性别结构平衡的大月份引产，是否考虑到妇女的生育健康的后果？我们是否急需改变那些陈腐非人道自私观念欲望和习俗文化并接受新知识和改善新技术？诸如避孕技术上的为什么是子宫控制中心而非输精管结扎？至于知识上压迫性无知妄说，导致精种崇拜、“子宫原罪”、怪罪婴儿性别来自母亲而非父亲，近乎疯狂的求子习俗普遍盛行如何改善？对性、孕、育、健康观念态度行为的改善，就像制度文化结构改变一样，必须首先掌握社会性别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才能迈出改进的第一步。正如DAWN的核心人物著名学者吉塔·森所言：“性别视角意味着认识到如下事实：妇女是处在生产和生育、经济活动和人类关怀的十字路口上的，因此也是位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交叉点上。她们存在于这两个领域里的工作中——她们最负责任，因此也最利害攸关；当两个领域存在冲突时，她们最受到伤害，所以她们对更好地整合两者的需求也最为敏感。”^①处于两种生产的交叉口的妇女，其贡献和付出应当受到权力拥有者和所有人对她们生育健康权利的关怀和尊重。

杜芳琴

2016年9月

^① 转引自卡比尔《社会 性别，贫困与发展政策》导论前引文，陈澜燕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1)
一 研究的缘起	(1)
二 研究的意义	(6)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7)
一 国内研究现状	(8)
二 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	(13)
三 国外研究状况	(15)
第三节 运用方法与写作思路	(20)
一 历史人类学的“深描”法	(20)
二 社会性别分析方法	(21)
三 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	(21)
四 口述史方法	(22)
五 文献研究法	(23)
第四节 村庄的选择与调查的过程	(24)
一 为何选择西村	(24)
二 调查的过程	(27)
三 相关概念以及研究范围的确定	(29)
第五节 章节安排与内容	(30)
第二章 西村：一个位于南洞庭湖的村庄	(33)
第一节 西村建制与自然环境	(33)
第二节 西村的农作物生产与性别分工	(37)
第三节 人口发展历程	(45)

第四节	姓氏、家庭结构与妇女	(49)
第五节	村庄政治结构	(52)
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村落政治	(52)
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村委会	(54)
第三章	浮出历史地表：西村传统生育文化	(62)
第一节	传统的生命观与身体观	(64)
一	西村的生命观、宇宙观	(64)
二	对身体的理解：有等级的身体	(71)
第二节	生产之道：疼痛的记忆	(75)
一	怀孕的禁忌	(75)
二	产房的选择与布置	(77)
三	分娩方式	(78)
四	接生者的选择	(79)
五	难产之处理	(81)
第三节	生育的动力与压力	(84)
一	生育：为延续香火	(84)
二	生育：为提供劳动力	(87)
三	生育：为光宗耀祖	(89)
第四节	小结	(91)
第四章	新观念与旧思想的碰撞：计划生育的开端（20 世纪 50— 60 年代）	(92)
第一节	妇女的处境：两种生产的冲突	(94)
一	妇女解放：参加社会化劳动	(95)
二	解放路上的苦与痛：内与外的冲突	(103)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开端：妇女与国家	(108)
一	妇女的心声：少生少育	(108)
二	国家的考量：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与出台	(113)
三	西村的行动：妇女干部的重要性	(117)
第三节	节育知识的宣传：新观念的传播	(124)
一	计划生育专业人员的培养：西村两位积极分子	(124)

二	文字资料的宣传：以《湖南妇女报》为例	(132)
三	避孕方法的推广	(139)
第四节	不尽人意的结果：旧思想的顽固	(144)
一	20 世纪 50—60 年代西村的生育情况	(145)
二	五味杂陈：妇女对待节育的矛盾心理	(148)
三	不尽人意的结果	(151)
第五节	小结	(158)
第五章	由犹豫到接受：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20 世纪 70 年代）	(161)
第一节	计划生育工作组入村	(163)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与推广	(163)
二	集体化体制下的西村	(168)
第二节	阻力与压力：计划生育任务的落实	(177)
一	多种形式的宣传与动员	(178)
二	计划生育任务的规划与制定	(188)
三	干部们的两难处境：国家政策与村落文化	(196)
第三节	对身体的控制：各种节育方法的使用	(201)
一	口服避孕药：难忘的经历	(201)
二	宫内节育器（上环）：身体的第一次接触	(205)
三	人工流产：从限制到放任	(210)
四	绝育：从输精管结扎到输卵管结扎	(212)
五	节育的复杂性：多种节育方法的“体验”	(215)
第四节	两位结扎者（绝育者）背后的故事	(218)
一	吃螃蟹的女人：西村最早的女性结扎者	(220)
二	“越界”：西村最早的男性结扎者	(224)
第五节	小结	(230)
第六章	冲突与妥协：独生子女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20 世纪 80 年代）	(233)
第一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西村妇女	(235)
一	集体的解散与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	(235)